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 理论范式

ZhongGuo TeSe HongGuan TiaoKong Di
ShiJian MoShi Yu LiLun FanShi

◎ 庞明川 / 著

理论范式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 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

庞明川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 / 庞明川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41 - 6426 - 8

I. ①中… II. ①庞… III. ①宏观调控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3.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824 号

责任编辑: 刘殿和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李 鹏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

庞明川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 010 - 88191355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s. tmall. com](http://jjkxc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30.5 印张 760000 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426 - 8 定价: 9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序

宏观调控无论是在中国官方文件中还是在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中乃至日常百姓的生活中都是一个高频词，也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反差现象：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目标和手段等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鸣和交锋，多数意见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目标泛化、工具庞杂、手段多元且常态化等特点，从而贴上偏离西方主流传统的标签加以质疑和批评；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和范式进行探讨，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衍生的理论概念，从目标选择到手段选择都不能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曾“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宏观调控也多持赞扬和肯定的态度。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外宏观调控绩效的鲜明对比，更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并开始注视新兴市场的经验，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了“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呼吁。这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必然有值得主流理论认同和借鉴的价值所在。问题在于，这些值得主流理论认同和借鉴的特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色？中国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也成为本书重点探讨的三大问题。由于拙著的篇幅较长，这里以自序的形式进行扼要提点，实则仅具导读的性质。

首先，从中国宏观调控值得主流理论认同和借鉴的特色来看，本书提出，经过近40年的长期实践，中国宏观调控逐渐形成了对西方经典宏观调控理论在两个层次上的重大创新与突破：第一，在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上，不仅注重总量调控，而且还更加注重结构性调控。虽然早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就从西方引入了“宏观控制”这一以总量调控为特征的概念，然而，在近40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中，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总量+结构”的调控范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双轨并行”的特色。第二，在结构调控方面，不仅注重需求结构调控，而且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控。在长期坚持对需求结构调整的同时，也不时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凸显出中国宏观调控在结构调控上的“需求+供给”组合。此外，中国的宏观调控还具有调控常态化，调控目标多重、政策工具多样化等特点。据此，本书认为，结构性调控是中国宏观调控最大的特色，因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范式即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并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调控范式，以区别于西方主流经典宏观调控的总量调控范式。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这种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范式，不仅明显区别于西方主流经典宏观调控的总量调控范式，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体系。从理论层面上看，第一，确立了“总量+结构”的调控范式。在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上，西方经典宏观调控理论诞生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并以总量调控为鲜明特征。然而，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实践中，这种总量调控范式虽取得一定的调控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体现在应对重大的经济危机与外部冲击时总是显得无能为力。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总量政策及其局限性引起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与反思。而事实上，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客观上要求政府的宏观管理应以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因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反映宏观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经济结构总是体现在一定的经济总量之中，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会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反之，经济总量总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总量，总量的变化总是通过各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这样，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经济系统的整体。这就要求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方式的宏观调控理论本身就应该同时包含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两种方式。当然，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既具有各自不同的政策边界与适用范围，也可以相互协调配合。从调控的具体对象来看，总量调控只能解决经济总量的非均衡问题，而结构的失衡则需要通过结构性调控来解决；当总量非均衡与结构失衡同时发生时，则应采用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一般说来，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的结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总量调控为主、结构性调控为辅，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采取这一形式。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微观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相对灵敏，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与调节机制也相对完备，因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不突出，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量非均衡。因此，宏观调控更多地借助于总量调控。另一种是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总量调控为辅，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采取这种形式。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缓慢、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市场监管缺欠等导致结构性问题突出，因而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对此，发展中国家的宏观调控应对结构性调控给予更多的侧重。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中结构性调控的任务比发达国家艰巨得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结构失衡现象又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需更多地倚重结构性调控。第二，确立了“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范式。在结构性调控中，需求结构调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构成了结构调整的完整内容。一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行既需要总量平衡，也需要结构平衡。在结构平衡中，供求平衡是最为重要的平衡之一，因为供求结构是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性结构之一。供求平衡既需要供求总量保持平衡，也需要供求结构保持平衡。然而，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只重视总量调控而忽视结构性调控，或者说只注重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而忽视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除中国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只是盲目地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未能结合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结构性问题的特点而实施富有自己特色的宏观调控。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中，虽然实施了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而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结构性调控范式，但在结构性调控中长期偏好于对需求结构的调整，虽然不能说忽视对供给结构的调整，但起码可以说未能将对供给结构的调整放置于与需求结构的调整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宏观调控既要继续重视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也要加强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改变过去长期只重视对需求结构进行紧缩与扩张的调整而忽视对供给结构进行相应调整的现象。这进一步丰富了结构性调控的内涵，使得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控范式的内涵更加完整，也更为丰富。从政策层面上看，在西方传统理论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总量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而从中国结构性调控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宏观政策都可以作为结构性调控的政策工具使用，包括经济计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等。例如，虽然货币政策在总量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现实经济微观主体的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工具本身存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无论是从实施还是产生的效应，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的存在，将随着经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不同，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程度，而对经济微观主体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虽然也可以发挥总量政策的调控作用，但是，更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税收政策、补贴政策、政府采购等对经济结构调整发挥更大的作用。一般而言，财政总量性政策往往是短期的、外在的，财政结构性政策往往是中长期的、内在的，二者相互包容，相互促进。而且，财政结构调控的目标通常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具体的总量性政策来实现的。对于结构性调控来说，短期内结构的失衡需要具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来调控，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则需要财政

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一起综合配套来解决。产业政策则是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指导和影响产业结构发展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和,是国家意志在不同产业部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因此,产业政策对于结构性调控的意义更加重大。收入分配政策是指国家为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针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措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他如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等同样体现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往往通过鼓励 and 限制等措施来实现不同的结构调整目标。从调控方式上看,结构性调控既有包括行政与法律手段在内的直接调控,也包括结构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内的间接调控。在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与间接调控相对应的是总量调控,而结构性调控主要使用直接调控和行政手段。事实上,在中国的结构调控中除大量使用直接调控手段之外,间接调控手段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由此,结构性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总量调控政策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体系,并弥补了西方主流反周期政策仅包含总量政策的缺陷。

其次,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形成机理来看,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形成了明显不同于西方总量调控的结构调控范式,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此,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宏观失衡思想、社会再生产理论所创立的总供求平衡理论都对中国的宏观调控起到了深刻影响,而且,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也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综合平衡、结构调整、独立自主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都对中国宏观调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反观西方经济理论,仅仅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总量调控方面的借鉴意义。

具体地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现了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统一性。因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两大部类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平衡条件看,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反映了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一致性。因此,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结构平衡与总量平衡是密不可分、互为条件的。马克思的总供

求均衡理论，既包括总量均衡，即各种价值形式的供求均衡，也包括结构均衡，即各种物质产品的供求均衡，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中国当代经济思想中，综合平衡、结构调整与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仅一脉相承地贯穿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当今执政党经济思想的始终，而且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被具体地应用于中国宏观管理的实践。其中，对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明显包含了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内涵。对此，有学者认为，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综合平衡的经济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结构调整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调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投资比例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加大投资力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提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体现了在新的背景下对结构调整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于独立自主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只有在开放中有批判有原则地学习吸收外国的长处，才能创造出中国自己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才不会产生民族虚无主义而丧失民族自信心；而也只有在独立自主中呈现出开放性，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这一思想贯彻到宏观管理的决策中，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没有盲从西方经典而独具自己的特色了。而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理

论领域,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像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那样自始至终都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自始至终都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经典理论。

最后,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发展方向上看,本书认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取得了五条基本经验:第一,立足自身国情基础,在借鉴古今中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不拘泥于传统经典,不断探索与创新,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宏观调控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宏观调控最为重要的经验。第二,充分认识并确立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不断拓展宏观调控的内涵,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与方式。一是在宏观调控的内容上,将西方发达国家单纯的总量调控扩展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举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实践模式;在结构性调控中不仅重视对需求结构的调控,还提出要加强供给结构的调控。这既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经验,也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对宏观调控理论的贡献。二是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上,不仅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传统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先后增加了结构调整、房地产价格、土地、粮食安全、节能减排、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等民生问题的调控目标,形成了兼具长短期目标的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目前,最为权威的提法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最新的提法是2015年11月3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三是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上,不仅高度重视西方宏观调控中惯常使用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且还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注重发挥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等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四是在宏观调控手段上,在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的过程中,注重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同时,还注重发挥行政、法律等手段的辅助作用和协同效应。其中,必要的行政手段的使用弥补了单靠经济手段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五是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注重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短期措施

和中长期措施并重。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在注重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注重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如改革初期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银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及近年来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松绑、降低税负为中小企业轻身，以“负面清单”划清政府市场界限、财税金融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反垄断、反腐败等，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了调控的重点是从供给的角度加强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也意味着要由长期注重需求政策向供给政策转变。六是在宏观调控的方式上，由“强刺激”转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转向“定向调控”，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急刹车”改为“点刹”，并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调，提高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第四，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第五，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民生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当然，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在历次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体现：一是宏观调控的泛化问题；二是短期政策长期化的问题；三是行政手段的运用问题；四是宏观调控力度的把握问题；五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问题；六是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问题。这些问题既包含了宏观调控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问题。要真正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就需要切实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与未来展望，如果将西方经典的总量调控与中国特色的结构性调控分别简称为“西式”与“中式”，那么，理论上可能存在四条可能的发展路径：一是中式归西。即仍奉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为经典，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成熟之后走上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殊途同归的道路。实际上，这是中西合一的发展路径，即中国的宏观调控最终实现向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接轨。这应该是目前大多数信奉西方宏观调控为经典的学者所持的意见和看法。二是西式归中。由于西方国家总量调控存在不能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固有缺陷，因此，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最终汇聚到中国特色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范式上来。三是中式独立。即由于制度与体制基础的差异，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独立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作为一种特殊的宏观调控范式独立存在。四是推陈出新。这一发展路径是指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宏观调控范式。当然，这种发展路径仅仅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存在。目前看来，如果脱离对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推出一种新的调控范式，现有的理论尚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从上述宏观调控未来发展的四条路径中可以看出，第一条“中式归西”和第四条“推陈出

新”的发展路径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固然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存在着重大缺陷，也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尚不能对脱离经济实践的理论范式予以支撑。因此，最有可能的发展路径是第二条，即“西式归中”的路径，将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使在短期内不能实现，最起码也能做到第三条，即“中式独立”的发展路径。这是因为：第一，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一是总量调控政策虽具有一定调控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将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结合起来。二是长期推行需求管理政策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需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经济运行的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第二，中国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与体制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不仅需要进行总量调控，还必须长期坚持结构性调控。第三，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要求坚持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在谈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些论述强调了辩证地看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重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探讨来说亦是如此。30多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总结，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发展更需要理论的指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对于中国宏观调控问题的学习和研究，如果从公开发表第一篇相关的论文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的漫长过程，并先后得到了大连市社会科学院2007年度社科成果后期资助、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060263 W2010131)、东北财经大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DUFE2014J07)等的大力资助。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先后在《财经问题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改革》等刊物公开发表多篇论文，并分别被《国民经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经济研究参考》《中国经济学年鉴(2009)》转载和转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在此，衷心感谢上述期刊与出版社的关心与支持。

是为序。

庞明川

2016年12月

0 导论 / 1

- 0.1 从“巴山轮会议”说起…… / 2
- 0.2 相关文献综述与存在的分歧和误区 / 9
- 0.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研究的演进及其内涵 / 29
- 0.4 探究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32
- 0.5 总体思路与结构线索 / 35

第1篇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源流考察

第1章 中国经济思想中的宏观调控思想 / 39

- 1.1 中国古代宏观调控思想 / 39
- 1.2 中国近现代宏观调控思想 / 74
- 1.3 中国当代宏观调控思想 / 91

第2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思想 / 134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宏观调控思想 / 134
- 2.2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 / 144

第3章 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理论 / 159

- 3.1 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思想 / 159
- 3.2 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理论 / 167
- 3.3 发展经济学论政府的作用 / 176
- 3.4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思想 / 188

第2篇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政策绩效

第4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产生的宏观背景	/	205
4.1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	/	205
4.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产生的实践背景与理论背景	/	210
4.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产生的思想背景与政策背景	/	226
第5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的发展演变	/	232
5.1 转轨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	232
5.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的演进	/	243
5.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的总体特征	/	256
第6章 宏观调控实践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	/	262
6.1 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特色	/	262
6.2 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特色	/	283
6.3 转轨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特色	/	304
第7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绩效的宏观评价	/	310
7.1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绩效的总体评价	/	310
7.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绩效的阶段性评价	/	320
7.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	325

第3篇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范式与发展方向

第8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范式及其贡献	/	340
8.1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范式研究的缘起	/	340
8.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	/	356
8.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范式	/	363
8.4 中国特色结构性调控范式的理论贡献	/	377
第9章 中国特色结构性调控范式的形成逻辑	/	384
9.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	384
9.2 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	418
9.3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宏观调控的重大影响	/	425

第 10 章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存在问题与发展方向 / 432

10.1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 432

10.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与创新发展 / 443

10.3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与未来展望 / 461

参考文献 / 466

0 导 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反差现象: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目标和手段等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鸣和交锋,多数意见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目标泛化、工具庞杂、手段多元且常态化等特点,从而贴上偏离西方主流传统的标签加以质疑和批评。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宏观调控就曾“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和赞赏”。^①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宏观调控也多持赞扬和肯定的态度。^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外宏观调控绩效的鲜明对比,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反思宏观经济政策,^③并开始注视新兴市场的经验,^④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了“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呼吁。^⑤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宏观调控必然有值得主流理论认同和借鉴的价值所在。那么,这些值得主流理论认同和借鉴的特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色?此其一。其二,如果从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正式引入“宏观控制”算起,中国的宏观调控已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论语·为政》曰:“三十而立”。那么,在经历了30多年的长期实践之后,中国的宏观调控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实践模式与理论特色?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与理论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色?

上述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对中国宏观调控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系统探讨上。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有助于澄清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模糊认识,回应国内学者的质疑和争鸣,正确认识中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宏观调控的差异,更好地指导“新常态”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其二,由于中国的宏观调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的探讨,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三,由于中国宏观调控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相比较中所呈现出的独特性,探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对于丰富和发展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体系、创新宏观调控理论所贡献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本章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召开的一次特殊的学术会议开始,介绍“宏观调控”的由来及其意义,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浩如烟海的宏观调控研究文献及其存在的分歧与误区

① 陈锦华. 国事忆述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294.

② 刘超. 美国学者赞扬我国宏观调控政策 [N]. 人民日报, 2004-11-08.

③ Blanchard, O., G. Dell'Ariccia and P. Mauro.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0 (42): 199-215.

④ Frankel, J. A. Monetary Policy in Emerging Markets: A Survey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125. June 2010.

⑤ 史蒂芬·罗奇. 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 [N]. 英国金融时报, 2012-03-09.

进行分析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概念,从而揭示本书的研究主题。

0.1 从“巴山轮会议”说起……

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开始了最终目的地为武汉的6天行程。然而,游轮上却没有挤满平常可见的观览三峡美景的游客,而是载着3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部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学者。在此次行程中,在“巴山”号游轮上举行了一次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在此后30年中,这次会议被屡次提及,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未来,其历史地位被证明具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①

这次会议参会的国外代表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Cairncross),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世界银行官员亚德里安·伍德和菲律宾籍华人、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中方代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高尚全、杨启先,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国务院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吴敬琏,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戴园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吉元,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项怀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洪虎,国办研究室主任楼继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秘书李克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田源,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郭树清,在职博士生何家成等。从上述阵营中可以看出,国外代表中的托宾对非集中性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其手段具有广泛而深入的

^① 有关“巴山轮会议”的内容,可参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主要情况的报告[A].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言论选编[C].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5;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评述[J].经济研究,1985(12);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J].经济研究,2008(12);郭树清.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3);柳红.巴山轮会议[N].经济观察报,2009-09-07.

研究；科尔奈和布鲁斯则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病以及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凯恩克劳斯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体系的宏观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战时的硬控制经济到和平时期的软控制经济的过渡具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埃明格尔则对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中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具有独特的经验；其他外国专家如南斯拉夫的巴伊特、美国的琼斯、法国的阿尔伯特和日本的小林实等，也都在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而国内代表则涵盖了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官员、后来成为改革中坚的经济学家和学者。

198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从实践层面看，当时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的重点正在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它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搞活微观经济，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上要触动计划经济的核心——实物指令性计划，并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决策层面看，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在经济生活中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的作用。1982年秋举行的中共十二大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的是指令性计划。然而，1984年10月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缩小指令性计划，出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转折。特别是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出现了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对此，理论界明显缺乏成熟的经验和思想资源借鉴，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理论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①而在经济改革思想上在80年代初期深受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影响，到80年代中期则深受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影响。赵人伟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决策者和多数经济学家都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而是想在计划经济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请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来讲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背景，中国人听起来也比较容易懂。”^②布鲁斯1955年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

① 苏联和东欧国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经济改革的过程，进行了种种试验或探索，提出过许许多多的改革方案：（1）南斯拉夫在1950年宣布实行工人自治，率先进行改革，变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改指令性计划为社会计划，把国有企业交给工人集体管理，逐步形成了社会自治经济体制。（2）苏联于1965年决定实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在实行部门管理、兼顾地区管理的原则下，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调要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利益刺激效能。（3）波兰1966年改革主要是广泛采用经济手段，改进中央计划，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4）罗马尼亚从1967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其主要措施是，减少行政区划层次，取消企业管理一长制，实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集体领导制。（5）保加利亚在1968年提出完善计划体制，重视经济核算。（6）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的作用，主张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7）民主德国60年代在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投资、价格、信贷、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刻改革；可是到了70年代，由于国内经济出现困难以及外部影响等原因，民主德国逐步恢复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8）匈牙利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探索建立集中计划管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除南斯拉夫的改革走向极端外，这些国家的改革也没有突破对旧体制的完善修补阶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如旧，全盘国有化的指导思想和单一化的所有制结构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新的强化。在苏联，在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低级形式应逐步向高级形式转化的传统理论指导下，不仅城市经济早已全面国有化，而且国有化进一步向农业发展。

② 柳红，布鲁斯：东欧来风 [N]．经济观察报，2009-02-14。